

香港服务业发展对广东产业结构、就业变迁的影响

——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的检验

欧阳艳艳 王莹 李淑青

(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日益加深, 香港与广东的经贸关系已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 香港服务业迅速发展, 逐渐成为香港重要的经济支柱; 与此同时, 广东也确立了以第二产业领先、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的产业经济模式。由于粤港地理临近, 经济互补性强, 本文探讨了香港服务业发展对广东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分析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否契合配第·克拉克定理, 从而发现香港服务业发展不仅促进了广东的产业升级, 而且对广东就业具有间接影响, 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现代服务业; 产业结构; 就业变迁; 配第·克拉克定理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正式签署。这一安排旨在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的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此之后, 内地和香港又先后签署了补充协议一至四, 使得CEPA协议尤其是服务业开放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而2008年签订的“补充协议五”, 更使得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开放、贸易投资便利化、专业资格互认三个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经贸交流合作。CEPA的签订与完善, 不仅为香港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更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将为内地, 尤其是广东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两地优惠灵活的制度安排下, 广东和香港形成了独特的分工模式, 两地经贸关系日益紧密。2009年, 粤港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1199.1亿美元, 是1978年的近4倍, 其中, 广东对香港的出口增长最为明显, 由2000年315.30亿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1159.4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 广

东始终处于顺差地位，且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从贸易比重来看，目前广东与香港的贸易额约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 57%，占广东对外贸易总额的 20%。香港对广东的投资额也在不断增长，继 2008 年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2009 年达到 118.77 亿美元，占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的 58.5%。由此可以看出，广东与香港是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实践的引导下，关于如何遵循产业转移趋势调整广东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首先，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以全球化战略为基础和出发点，加速进行面向 21 世纪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这无疑将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产生深远的影响^[1]。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之一是服务业投资成为转移的新热点，并且这种产业转移趋向区域内部化^[2]。其次，产业转移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源泉，也是广东经济发展要顺应的趋势^[3]。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CEPA）将给广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新机遇^[4]。随着香港回归和 CEPA 的签署及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香港发展高增值的制造业与中国内地低水平的制造业相互促进，服务业向中国内地的转移是内地制造业升级的必备条件，这也是香港向中国内地的第二次产业转移^[5]。

对于产业结构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问题，早在 1949 年库兹尼茨就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而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又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钱纳里（1960）通过分析部门增长的决定要素出发，并利用 51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发生变化时，服务行业和农业变化最小，而制造业增长最大，由此提出产业增长的模式，并认为这种工业化模式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刘伟（1995）通过发达国家经济的初期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比较，证明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工业制造业的结构性扩张（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无论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是科技进步，或对资本效率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具有首要的意义；并由此说明这一时期的第三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低于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结构扩张更主要的作用在于完善市场化^[6]。刘志彪、安同良（2002）选取了 1978 年-1990 年和 1990 年-1999 年两个时间段，发现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表现出高度正相关关系^[7]。王兵、陈雪梅（2006）对

广东的产业结构效应与经济总量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 尽管广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都不具有平稳性, 但长期而言, 二者在统计上是高度相关的。广东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8]。

不仅如此,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爱文等(1995)通过研究1980年以来我国的就业结构变化, 认为我国的就业结构大致有以下几种变化趋势: 一是相对于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就业比重在上升; 二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 其中,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较慢, 有时下降, 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较快。从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偏差来看, 我国的结构偏差系数仍然很大^[9]。喻桂华和张春煜(2004)通过对历史数据和国际数据的比较研究, 发现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在于劳动就业结构滞后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产生了结构性偏差, 并且偏差的收敛速度慢于国际经验。分别从三次产业看, 偏差产生的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 工业生产中普遍采用了劳动节约型技术, 发生资本替代劳动, 以及第三产业增长缓慢和结构失调^[10]。谌新民等(2006)从产业结构偏差系数研究广东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关系, 发现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是不同步的, 两者的背离程度较大^[11]。刘永强(2006)等学者发现在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三次产业结构的位次实现了由“二一三”向“二一三”^{*}的转变。这基本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但产业结构转换仍严重滞后于总量增长的要求, 特别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与当前的收入水平相对应, 第二产业比重过大, 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收入比重都较低^[12]。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将探索香港现代服务业和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性, 并进一步检验广东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是否满足配第·克拉克定律, 以论证香港服务业对广东就业变迁所起的作用。

三、香港服务业的发展与广东产业结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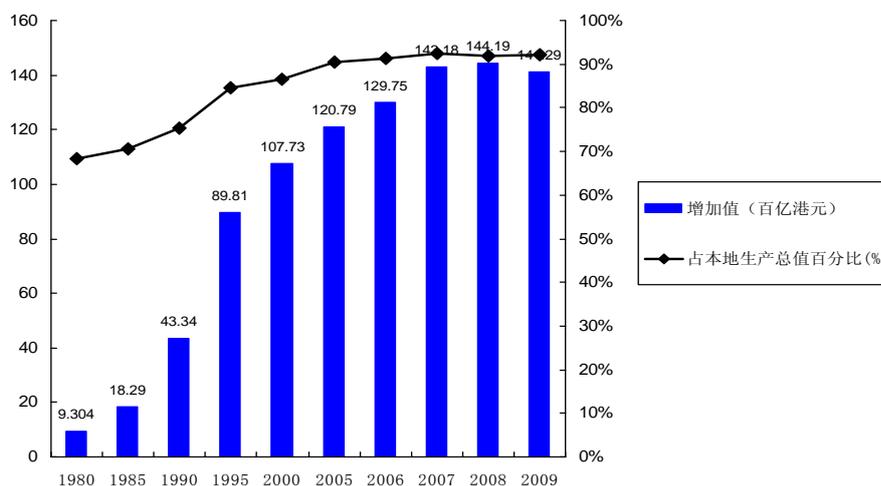
长期以来, 香港经济就与广东产业结构的变化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贸易发展到“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 再到先进产业的转移, 粤港合作从此走向多元化, 香港服务业开始进军广东, 并最后与广东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产生明显的依存和互动关系。

(一) 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这里的“二一三”表示产业结构的比重由高到低分别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 后面的表述也是同理。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香港日益发展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如图1所示,1980年香港服务业的增加值为930.4亿港元,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超过一半,为69.2%,远远大于第三产业的30%和第一产业的0.8%。20世纪后期,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一直持续上升,至1990年已达75.4%,1999年进一步增长为86.1%。进入21世纪,香港服务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2009年香港服务业已占总产值的92%,成为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重要的服务中心和服务出口地,不仅具有人才、信息、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还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快速发展的服务业中,贸易与物流、金融服务、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和旅游是四个最主要的行业,占总服务业的50%以上。

图1 香港服务业增加值以及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2009年)



资料来源:来自香港统计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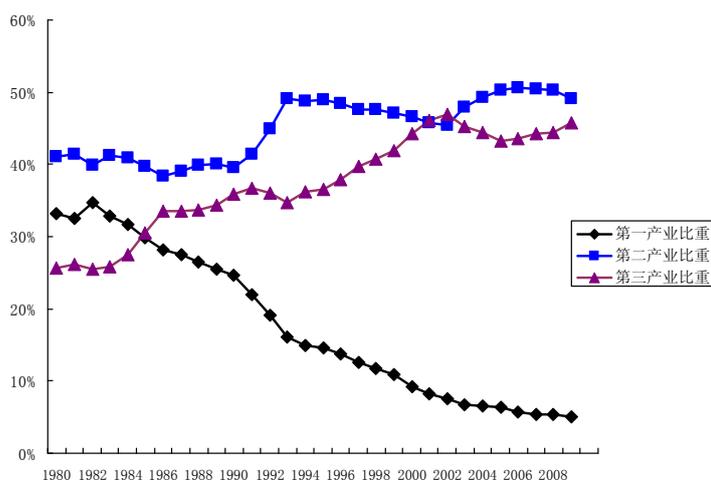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服务业比例一直在大幅上升。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本地制造业由于成本上升、结构调整滞后等问题失去了原先的优势,大量向中国内地转移。于是,在香港具有高度开放型和包容性的经济环境下,由于农业的“先天不足”和制造业的“萎缩”,再加之服务业的生产力和边际利润都远远高于制造业,因而资金和劳动向服务业发生自然转移。所以,第三产业逐步成为香港的主导产业,而且朝着服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服务经济”的明显特色。若说20世纪80年代前香港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制造业的兴盛,那么80年代后香港经济的发展则主要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伴随着服务业国际化,香港作为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国际地位日益巩固,香港现代服务业已大大超过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在香港第三产业以及整体经

济的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广东产业结构的变化发展

在香港产业结构日趋以服务业为主的同时，广东的三大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图 2 看出，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急剧下降，第二产业出现波动，小幅上升，而第三产业则是急剧上升。这其中还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1978 年至 1985 年，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趋势。1985 年，第三产业就超过了第一产业，这是广东凭借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 1986 至 2002 年，这期间第一产业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继续上升，并且一度赶上第二产业，该阶段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 GDP 增长速度，在三大产业中居首。具体来说，2001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5544.35 亿元，占广东国民生产总值的 46.05%，比第二产业高出 0.32 个百分点；2002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6343.94 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6.98%，又比第二产业高 0.48 个百分点。第三个阶段是 2003 至 2009 年，第一产业继续下降，第二产业先是超出第三产业，后两者又逐渐趋近。2003-2006 年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部分投资未能形成服务产出能力等原因，使得第三产业滞后于第二产业；2006 年以后，随着第三产业投入产出的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再次接近第二产业。2009 年广东第一产业产值为 2010 亿元，但只占 GDP 比重的 5.1%；第二产业产值为 19419 亿元，比重为 49.2%；第三产业则实现产值 18052 亿元，比重为 45.7%。

图 2 广东三大产业比重走势图（1980-2009 年）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三）香港服务业发展对广东三大产业的影响

1、香港服务业发展与广东第一产业的衰落

改革开放前，农业依然是广东的主要产业，对 GDP 的贡献仅次于第二产业，并且远远超过第三产业；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农业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绝对生产量的增长，农业的地位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是下降的。特别是从 1983 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为广东的第二产业以及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 1985 年，第一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已被第三产业超过。广东这种产业变化，除了国家政策因素之外，还与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有关。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已开始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升级，为了给自身服务业的发展留出空间，香港开始在毗邻的广东投资建厂，把纺织和服装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放在广东，并辅以配套的生产性服务和专业服务，这一产业转移促使该时期广东的第二、三产业的产值都迅速增加。总的来说，广东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使第一产业的地位下降，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地位得到提高。

2、香港发展现代服务业，促使广东制造业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所谓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那些依托电子信息等高级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部门。具体包括金融保险、商务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教育和保健服务、通讯服务等高增长的服务部门，以及网络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等新兴服务部门的一部分被新技术、新经营方式改造过的传统服务部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香港着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开始把一些相对低端的生产性服务向广东转移。签订 CEPA 协议后，内地向香港开放了服务贸易，香港的生产性服务得以大量进入广东。由于使用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不仅有助于在生产中应用新的技术，而且可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广东制造企业也对香港的服务业有着极大的需求。据香港贸易发展局在珠三角对厂商使用服务外包的调查显示，珠三角厂商首选的香港服务包括：产品或技术开发、设计、国外物流、国外营销和金融，此外，还有管理咨询、企业顾问、财务和人才培养服务。香港服务商为广东制造商提供的这些生产性服务，无疑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对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加强内部管理与成本控制、提升资金结构及增加融资渠道有着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使用香港生产性服务提高了广东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3、CEPA 背景下香港向广东加大服务业投资，唤醒广东第三产业发展活力

虽然目前广东服务业拥有企业 50 多万家，就业人数超过 1800 万人，产值超过 1.8 万亿元，

已经具有一定的绝对规模，但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却远不如香港，而且也低于世界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平均水平，这都说明了广东的服务业还处于上升期，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如此，广东的内外资企业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近几年许多企业遇到民工荒问题，说明部分原来在珠三角打工的外省民工选择在其他地方工作，劳动力资源已不具备优势，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做法难以为继。因此，在香港新一轮服务业转移的形势下，广东的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企业必须搬迁到粤北和两翼山区，甚至转移到省外，以腾出空间引进服务业以及其它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另外，粤港两地服务业的合作具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2008年，国务院批准25项对港服务业开放政策在广东“先行先试”，确定了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等市作为重点市。“先行先试”政策推出后，增强了香港服务业进入广东的信心，香港投资广东服务业项目增多。香港同行通过“鲶鱼效应”给内地的服务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广东的服务业者改善管理能力，提高服务水平。由于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广东后首先落户在深圳和广州，这对于这两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广东第三产业的增速不断加快，并在近几年与第二产业产值的差距越来越小，说明广东服务业正在发挥着强大的生命力。

四、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就业变迁的关联分析

在前文的叙述中，我们探讨了香港服务业与广东产业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影响。接下来，我们将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分析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效应，进而研究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对广东就业变迁存在的间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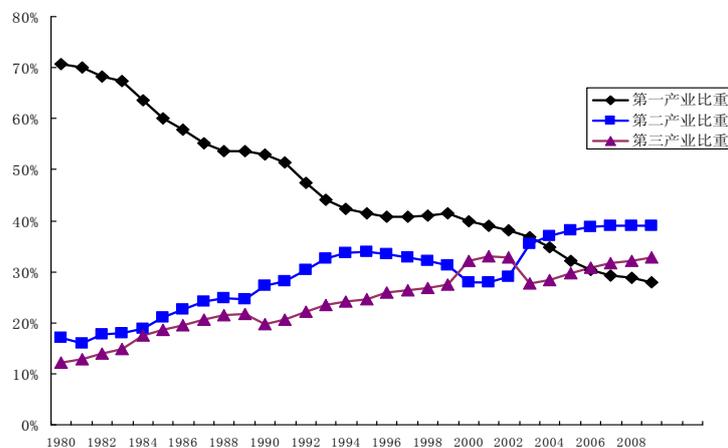
（一）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联性

1、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其在广东的表现

配第·克拉克定理说明了经济发展中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变化的规律。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计算了多国各部门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该理论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那么，广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关系是否满足配第·克拉克定理呢？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趋势。其中,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至2001年为第一阶段,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所占比例逐步上升,整个就业结构是“一二三”的层次结构;2001年至2004年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波动增长,但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呈现“一三二”的层次结构;2005到2009年为第三阶段,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继续下降,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持续上升,就业结构也呈现“二三一”的层次结构。

图3 广东三大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图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将图2和图3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化与就业比重变化的趋势一致,即都呈现出第一产业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持续上升的态势,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是“二一三”,而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是“一二三”;之后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变为“二三一”,但就业比重仍为“一二三”,直到2005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才超过第一产业,变为“二一三”,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2007年才超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开始出现“二三一”,完全与产值比重一致。也就是说,直到近年广东才开始严格地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而在此之前,就业结构变化在时间上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

2、广东就业结构变化严重滞后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劳动力需求是生产需求的派生,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带来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通常而言,为迎合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必将做出适应性调整,最终带来整个就业结构

的变化。但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适应性调整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期，调整具有更大的时间刚性，故相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进程而言，就业结构的配合性调整往往具有滞后性。

广东在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最初阶段，由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多为教育水平低、劳动技能和生产率差的劳动力，不太适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因此不能直接转移到第二产业，只能转移到对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要求较低的传统第三产业，因此就业结构无法由“一二三”直接升级到“二一三”，而要经过“一三二”格局。此后，伴随着劳动者收入水平和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传统第三产业中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又开始转移到第二产业就业，同时一部分高素质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也直接向第二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不断增大，最终才出现了“二一三”的就业格局。正是由于这样的演变过程，导致了就业结构的调整严重落后于产业升级的速度。

（二）香港服务业与广东就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根据之前的分析，我们得知香港服务业通过影响广东省产业结构，进而会对广东的就业结构产生一些间接影响。为了揭示这种潜在关系，我们选取 1980-2009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以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广东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解释变量，以广东三大产业的就业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香港服务业和广东就业的相关性。为减小数据波动带来的误差，我们将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取对数形式。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和各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实证模型设立如下：

$$employ_{1,2,3} = \alpha + \beta \ln(service) + \mu(output_{1,2,3}) + \varepsilon$$

表 1 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名	变量定义
$employ_{1,2,3}$	广东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的比重
$\ln(service)$	香港服务业增加值的对数
$output_{1,2,3}$	广东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首先进行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判断其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由于模型所涉及的三组时间序列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结果由表 2 显示。

表2 香港服务业与广东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第一产业	-0.076673	0.035382	-2.167041**
第二产业	0.054345	0.026229	2.0720**
第三产业	0.017950	0.008902	2.016382*

注：*表示通过 10%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 5%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 1%显著性检验。

由于最小二乘回归要求残差满足服从独立的正态分布的假设，所以在我们对相关性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残差进行检验，确保其满足同方差和无自相关的条件。经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与香港服务业增加值的回归方程中并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同时我们对存在的自相关问题，采取了添加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项，消除了自相关问题，从而使得回归方程的残差满足假设要求。

上述结果表明，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对广东就业结构变化确实存在着影响。根据三大产业就业比重对香港服务业增加值的回归系数可知，香港服务业对广东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的影响为负，而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的影响为正。且从系数的绝对值来看，香港服务业的增加值对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小是第三产业。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先期判断。由于香港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向广东进行产业转移，不仅增强了广东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促进了广东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广东第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增长更快，从而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在这一过程中，第二产业又比第三产业发展更快，故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力。随着广东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正如前面分析所讲，这样一来使得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

（三）香港服务业对广东就业的影响

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香港服务业作用于广东的产业升级，而广东的产业变动最终会促进广东的就业分布，因此，香港服务业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广东的就业结构。

1、香港服务业对广东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

首先，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由于产业转移进入广东，加上 CEPA 等有利政策制度的保障，更使香港与广东全面开放服务项目，促进了广东先进制造业的增长，从而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从 2005 年开始广东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超过了第一产业，第二行业吸收了更多的劳动力。另外，由

于香港服务业的企业加大对广东的投资，特别是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使得珠三角沿海城市更多地承接了香港服务业的转移，劳动力逐步流向第三产业，同时由于土地、劳动力成本较高，使得原本在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迁往东翼、西翼和山区部分城镇，吸收了当地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当地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就业比例都得到提高。

2、香港服务业对广东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

香港服务业通过两个途径对广东第三产业就业形成影响：一是促进了广东第三产业的产值提高，从而间接带动就业，这是由于 CEPA 下香港与广东开放服务项目，香港生产性服务进入广东，促进广东服务业的增长。而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广东后首选深圳和广州，于是这两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得更快。另一个途径是香港服务企业直接进入广东，吸收当地的劳动力，使广东劳动力向第三产业倾斜。港澳台在粤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从 2000 年的 103 万人上升为 2009 年的 658 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 2.5% 上升为 11.6%，自从 2004 签订 CEPA 协议以来，港澳台在粤投资企业的从业人数稳定地占据了广东从业人数的 12% 左右。这里面港资企业所占比重最大，在广东吸收的就业人数也最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服务业和广东产业结构的发展，说明了香港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广东第一产业的衰落，促使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通过对广东三大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变化的分析，我们发现，广东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基本上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但在时间上却存在着就业结构变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的情况。即便如此，由于产业变化最终决定了就业变化，我们认为香港服务业对广东就业结构有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应加强粤港澳服务业的区域合作，推动广东产业升级的步伐。广东区位优势，毗邻港澳，完全可以借助于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的地位，加快融入国际化的步伐。同时以 CEPA 为契机，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借鉴经验，合理分工，提升服务业发展的档次。此外，CEPA 更是给广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带来了新机遇。广东应抓住先机，带头建立和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在这一关系下，更加充分利用香港服务产业的优势。以此为依托，抓住第三产业转移为主流的新一轮国际转移的机会，创造良好的条件，吸引并且有选择地承接境外、台湾、香港等地服务业转

移,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产业。

其次,在省内不同区域统筹安排,积极发挥珠三角的先行作用,带动东西两翼和山区发展,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利于改善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和反映能力,有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对于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越来越高,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制造业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面临着升级改造或淘汰转移的压力。这时,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和衰退产业转移出去,一方面,有利于珠三角为高附加值的产业腾出空间和节省资源,以便集中力量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而实现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欠发达的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其产业中心正从轻纺工业发展到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起主导作用,此时因地制宜地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有利于发挥本地的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优势,推进整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工业化的进程。

再次,由于就业结构受制于产业结构,广东应进一步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广东要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形式,即同步实现“三二一”的结构,就必须借助香港外力,促进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传统第三产业向现代第三产业过渡,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来提高就业人数和就业率,改善就业结构,真正把“保增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同“促就业”结合起来。为实现这一目的,对于第一产业,应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给予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以充分的保障。与此同时,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与管理,提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加速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对于第二产业,对于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说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力不足,这时不应该继续让其吸收低素质劳动力,而应进行第二产业的升级,更多地发展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增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对于第三产业,则需要“两手抓”,一方面,发展资本密集型第三产业,有助于解决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另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则有助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有利于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参考文献:

[1] 刘辉煌、杨胜刚、张亚斌、熊正德. 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向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J]. 求索, 1999(1):4-9.

[2] 潘叙迭. 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及广东应对策略[J]. 广东经济, 2006(2):35-37.

- [3] 游霭琼. 产业转移的国际化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 [J]. 南方经济, 2005(5):37-39.
- [4] 邓利方. 国际产业转移与广东承接对策 [J]. 南方经济, 2003(12):62-64.
- [5] 葛和平. 香港产业转移对两地经济的影响及合作策略 [D]. 河海大学, 2005.
- [6] 刘伟、李绍荣.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5):14-21.
- [7] 刘志彪、安同良.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2(1):1-4.
- [8] 王兵、陈雪梅. 产业结构与广东经济增长——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J]. 暨南学报, 2006(4):46-50.
- [9] 王爱文、莫荣和卢爱红. 中国就业结构问题研究 [J]. 管理世界, 1995(4):198-205.
- [10] 喻桂华、张春煜.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4(5):9-13.
- [11] 谌新民、杨永贵. 民工短缺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4):3-10.
- [12] 刘永强. 广东产业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J]. 特区经济, 2006(01):152-153.

The Effect of Servic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on Guangdo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Change: Based in Petty Clark Theorem

OUYANG Yan-yan, WANG Ying, LI Shu-q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have become inseparable. Since the 1980s, service industry of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 rapid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economic pillar. Meanwhile, Guangdong has also established a second industry-leading economic model.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nearness and the strong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on Guangdo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We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not only promot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also change the employment of Guangdong by examining if Guangdong'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changes fit the Petty Clark theorem. Finally we g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discussion.

Key words: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loyment changes; Petty • Clark theorem

收稿日期: 2011-12-12

作者简介: 欧阳艳艳, 女, 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 中山大学理论经济学进站博士后; 王莹, 女, 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生; 李淑青, 男, 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10wkjc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1CJL04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00480807)。

【责任编辑: 赵大英】